

# 坚持不懈的捍卫中国利益(上)

## 宣扬中国文化的杨永奎先生

杨永奎先生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爱国先贤。1911年出生在福建福清。在几岁的时候到新加坡,后来去上海念书。杨永奎先生喜欢艺术和画画,有很多的画友。后来在新加坡抗日,指挥唱抗日歌曲,因为是搞音乐的人士,所以一些反动派认为他是知识分子而要抓他,随后偷渡来到印尼。

1946年杨永奎先生在椰加达家中创办了印尼第一家华人画报《南洋画报》,出版月刊,他成为华人中唯一一个用图片介绍中华文化,宣扬中国文化的爱国者。他一个人肩负起画报的所以工作,排字、印刷、编辑、文章、照片等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一个人来做,他的妻子杨淑芬女士在画报帮助他排字、校对。当时画报的生意也并不顺利,杨永奎先生仍坚持编印画报,不走商场生意,用图片来反映中国的文化,宣扬当时印中友谊和合作发展不遗余力。他和他的妻子相濡以沫,一心意义为办好画报努力。

杨永奎先生的《南洋画报》报馆曾是印尼雅加达最早升起五星红旗的地方之一。1949年12月27日,荷兰对印尼350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侨居印尼的华侨同印尼人民一样感到光荣和欣喜,杨先生带着员工们怀着无限的喜悦和敬意,在报社旗杆上升起了印尼的红白旗和新中国的五星红旗。鲜艳的五五星红旗飘扬在雅加达上空。但此事却引来与地方警察的冲突,他们要求杨先生把中国红旗降下,在杨先生和其他华侨的据理力争下,警察才惺惺离去。第二天,更多的五星红旗在印尼红白旗的旗海中飘扬起来。

1955年4月18日-24日,亚非29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尼万隆举行了第一次亚非国家团聚合作的国际会议,为确保代表团的安全,因为以记者身份便于出入会场,利于保卫工作。中国驻印尼使馆发动华侨以记者身份担负起保卫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的任任务。其中杨永奎先生就是这些“记者”中的一份

子,他自愿担当起中国代表团的保卫任务。守在周总理身边有一个高大的身影,那就是杨永奎先生,他眼睛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他是印尼第一家华人画报《南洋画报》创办人杨永奎先生。在采访中,杨先生的遗孀杨夫人回忆说,那些日子很紧张,杨永奎极少回家;有一次回家时对她说,不要担心,他就是要用自己的身体为周总理挡子弹;叮嘱她如果发生意外,一定要把孩子抚养成人。如今他的儿女们都有了不错的业绩,成为社会上的精英、国家的栋梁。

在他们一心一意做画报的同时,困难和挫折一次又一次的冲向他们。他们居住的房屋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迫迁,当他们的房屋承受着第二次迫迁的时候也是他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当时有人来到他们家把他们的东西全部丢到外面,要把房子给铲平破坏掉,使得他们走投无路,《南洋画报》的机器被放在仓库里,但后来也不翼而飞。他们没有地方住,不得已把孩

子分开到亲朋好友家里住,差不多同时一些反动派说他是共产党,杨永奎先生也被抓,家人彻底分散。后来因为人权问题才被放出来。

司徒眉生为文叙述刚于2010年9月13日逝世的司徒眉生前,曾在回忆中叙述《南洋画报》杨永奎的奋斗故事: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南洋画报》的老板在雅加达一条街上租了一个阿拉伯侨民的房子,作为办公地和编辑部,后花园改建以后,就作为印刷装订场所和居室。后来这条街繁华起来,商业价值上涨,房主要改建商业楼宇,要求报社迁出。可是此时报社刚安装了全套进口印刷设备,拆迁损失很大,画报也无法维持按月出版发行,所以双方谈来谈去,未达成协议。

突然有一天早晨六点钟,《南洋画报》的社长杨永奎打电话到我(司徒眉生)家里,说不得了,你快来救救我吧!他说那个阿拉伯人勾结了官方,开着推土车,要强行拆迁,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方人士也说允许他们

拆迁施工;可是我们的当期画报正在印刷,如果停下来,损失不得了。你不来帮忙不行了!

我认识画报社的人,那个社长的夫人是我父亲的学生,但也没有太多的交往。我马上赶去现场了解情况,警察说他们局长已批准拆迁,他马上也过来。我说,你等我首先和局长见面再说。我穿着便服,他们也不知我是谁,但是一看来头不小,也不敢问。后来局长来了,说他们有正式的批件,因为画报社不合作,对方的补偿条件他们不接受,又不向官方提出正式抗辩,只好这样。我说这样不行,影响巨大。他说我是奉命行事。我问你是奉谁之命,他说是某某总局长。我不认识那个局长,情急生智,立刻打电话给雅加达特别行政区的省长苏玛诺博士--此人就是马利克当外长后,驻香港总领馆陪同到澳门来看我的那个少将。当时我们刚与他的首都特别行政区合作,创办了《首都日报》,我是社长,自然和他很熟。我在电话上说: